

SHI · JI · ZHI · JIAO

江蘇人民出版社



世界走向 新秩序

王邦佐 桑玉成 著



000
F8102
215

世界走向 新秩序

王邦佐 桑玉成 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P 书名 3.6.2 版

(苏)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世界走向新秩序

著 者 王邦佐 桑玉成

责任编辑 王楠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地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通县印刷总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页 2

印 数 1—3000册

字 数 118千字

版 次 199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0885-8/C·46

定 价 2.45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夏 翠

20世纪即将过去，它背负着历史的重荷，以及对新世纪的企盼行进；新的世纪正带着几分热望和几分焦虑凝视着我们。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是一段关键的较量、抉择和转换时期。这一时期，从生存环境、经济态势、政治格局，到生活方式、文化心理，都处于一种艰难、痛苦的矛盾遑遽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展开以及新状态产生的渐进过程，孕育着一种历史发展的巨变。因此，与其届时蓦然回首，不如即时深沉反思。在关系到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纵横交错的立交桥上，需要冷峻、明睿的眼光，同时又是敏锐、迅速的反应。

当今，世界局势之动荡，人类心理之困惑，机遇和希望之涌现，前所未有。然而，已经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中华民族，必将以其特有的果敢和聪慧，驱散障眼的迷雾，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套丛书从十个方面，对世纪之交的状况作了简要阐述，旨在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提出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作者力求做到兼顾科学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而实际上很可能只是一孔之见、一得之功。但如能使读者得一启迪，并使我们得到指点，则实为幸甚。

1991.4

作者簡介

王邦佐 57歲，教授，上海師範大學校長，上海市社聯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長期從事政治學理論的教學和研究。著有《政治學概要》、《美國兩黨制剖析》等專著；發表《論當代的時代特徵》、《從“一國兩制”看主權與治權的關係》等學術論文數十篇。

桑玉成 36歲，副教授，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現在上海師範大學政治系任教。從事政治學行政學的教學與研究。有《公共政策學導論》、《當代國家公務員制度》、《行政學導論》、《衝突與合作》等（以上均為合作）編著；發表學術論文二十多篇。

《世紀之交》叢書編輯委員會

主 编：夏 軍

副主编：程林勝

编 委：(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 楠 米壽江 余孟仁

周安伯 夏 軍 張挂獄

程林勝 程極明 劉勇堅

ISBN 7-214-00885-8

C · 46 定价：2.45元

目 录

引言：穿越国界的政治	(1)
第一章 瞧，我们这个国际社会	(11)
世界变幻万花筒	(11)
观察世界风云的三条线索	(28)
分析国际格局的三个视角	(37)
第二章 什么塑造了国际格局？	(45)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46)
两代“三巨头”	(59)
“火山上”的秩序与两极的世界	(65)
意识形态化的国际政治	(80)
第三章 世界面临新的机会	(88)
雅尔塔体系的蔓延与变迁	(88)
不要War(战争)而要World(世界)的战略	(93)
从军备竞赛到裁军浪潮	(99)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格局	(107)
“合作”中的斗争与较量	(112)
第四章 人类召唤新秩序	(119)
国际社会“理想国”	(119)
个性化与一体化	(127)
新秩序的构想与待建	(130)

第五章 展望国际格局的21世纪	(138)
国际关系未来学	(138)
当我们跨进21世纪	(141)
美苏关系新走向	(145)
欧洲人的欧洲与欧洲一体化的步伐	(147)
窥视着世界动向的日本	(153)
姗姗来迟的第三世界	(159)
结束语：挑战与适应	
——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	(165)
后记	(176)

引言：穿越国界的政治

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说它大则大，说它小则小，大得难以度量，小得不可思议。视它为大的时候，面对着的是170多个国家，50多亿人口，149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使你利用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也很难想像能在你的有生之年踏遍世界的每一块土地。视它为小的时候，偌大一个地球，可以缩小成一个“足球”，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同一片绿茵场上找到那共同的“足球语言”。它已经连成了一个整体，往往是这头“感冒”，那边“发烧”，因而除非人们对它进行综合性的治疗，否则难以维持其健壮的体魄。

有人说，现在该把这个世界命名为“地球村”，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地球村”的村民了。

世界的这种变迁，归根结蒂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是那个给人类带来灾难、也给人类带来发展的资本带来的。土地受到了国界的限制，而资本却穿越峡谷，飞过海洋，走向了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名作《共产党宣言》里谈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时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为100多年来的政治实践所证实，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经济的世界性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明显。

在政治方面，其世界性特征至少有如下表现：

第一，政治流行。我们称某种疾病为流行性疾病，表明这种疾病患者的广泛程度及其相互影响；我们称街头流行何种时髦衣装，表明人们对这种衣装的追求心态；而我们这里所谓的政治流行，是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常常会出现一种基本的政治动向，这种政治动向具有流行性；从一方流行到他方，从一国流行到多国，从而形成世界性的政治变革。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远的不说，且说近代的一些历史事变，无一不是世界范围内的事变。资产阶级革命首先从英国开始，继而传到美国并于其后在法、德等欧洲国家普遍流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胜利以后，东欧及中国等国家也纷纷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亚非国家的民主化浪潮，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大势，诸如此类，也似乎给人一种有组织的统一步伐之印象。

第二，政治借鉴。著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论述过诸如地理、气候、习俗、传统等环境条件对政治的影响。根据这样的思路，什么样的环境条件哺育着什么样的政治，特定的政治模式只能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之中。但是，正是由于世界的共同性，政治借鉴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成为一国政治发展的手段和技术。

美国是一个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在这个大部分是外来移民的国度里，一开始受命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因此，一旦它独立之后，就需要用“借鉴”的办法吸取他国的经验来建构自己的政治模式。事实上，对1787年制宪会议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62）、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757—1804）等人的主要思想来源，就是英国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和法国孟德斯鸠的政治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政治改革，也借鉴了美国和英国的很多政治经验，从而才建立了它那具有日本特色的西方式政治模式。

第三，政治依赖。大凡国家都具有至高无上的不可分割的主权，这是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Bodin, 1540—1596）早在1576年就提出的重要观念。然而，自从近代以来世界逐渐连成一体以后，政治依赖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在很多情况下，某些国家虽然是主权国家，但它们实际上又往往必须依赖于其他一国或几国才能存在。这种政治依赖开始可能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可能就转变为主动的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以少数几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国际政治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国家程度不同地依赖于某个大国，在大国的保护下获得其国际社会成员的一席资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美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华约条约组织中的苏联和其他成员国的关系，都或多或少地表明了上述情况。

第四，政治干预。一国采取舆论的、物质的、武力的等等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接受某种观念或制度或其他条件的现象，都可以视为政治干预。政治干预之所以成为现实，也表明了政治的一种世界性特征。可以想像，如果一国与另一国本来就没有任何瓜葛和联系，政治干预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可能。只有在利益相关的情况下，一国认为不进行干预就将失去利益或得不到更多利益的时候，政治干预就很可能从此开始。

在当今这个世纪里，政治干预频频发生，俯拾即是。美国干预过朝鲜和越南，苏联干预过阿富汗。干预常常是非正义的，也可能是正当的。在本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之

初，伊拉克以武力干预的方式吞并邻国科威特，遭到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对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决议，并采取激烈的措施，实施了一种对干预者的再干预。

政治的世界性特征决定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即任何国家，要保持其脱俗于世界整体之外的孤立性地位，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作为整个国际社会中的一员，都必然地与其他国家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国家在履行着它的对内政治职能的同时，还要“越出国界”，履行其对外的政治职能。这就是国家的所谓“穿越国界的政 治”。考察我们这个世纪及下个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和走向，正是以这样的客观事实为前提的。

既然每一个国家都与国际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当一个国家履行其国际政治职能，即作为国际行为主体而活动时，就会对国际社会产生自己的影响。而在当代国际社会，由于国家类型、政府形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 的差别，在不同国家的国际行为作用下，国际间的关系也就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现象。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有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普遍的规律，即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它的对内政策总是有联系的。一般来说，对内政策是对外政策的基础，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这是因为，任何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归根到底都是“由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列宁认为，

“这一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我们要一分钟也不忽视这一原理，这样才不致掉进外交诡计的迷魂阵。”^①然而，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终究是不同的领域，国家的对内职能与对外职能也毕竟是不同的职能，因此，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也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决定和影响这一政策的，除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之外，还有国际环境、国际舆论、历史与现状、领袖集团的素质等等多种复杂的因素。正是基于这一点，即便是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中，也有可能表示出共同的倾向，达成某些共同的协议。这种在国家关系中形成的普遍规律，也是我们考察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依据。

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其政治经济利益为基础，这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原则。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说过，“所有的领导人，而不单单是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把他们的国家利益置于他们的个人好恶之上。”^②国家利益原则本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则，然而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原则为当时盛行的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流派所广泛论证和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在那个时候，世界大战的烟云使理想主义濒临破产。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利益正直接面临着法西斯国家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强调国家利益原则，并企求通

①《列宁全集》第27卷，第339页。

②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过国家的有效权力，使国家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

显而易见，为了确保国家利益免遭损害，国家权力的作用就尤为重要。国家权力被认为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这是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以来为很多思想家所提出的重要观念。马基雅弗利认为，由于人性恶以及人对利益和财富的欲望永无止境，所以社会动乱必定不可避免。为了维持人类社会的稳定秩序，就必须发挥权力的作用。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要以权力作为基本手段，尽可能地抑制别国的强大。他说，“谁成了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①英国思想家托玛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更进一步指出，“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②当代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904—）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认为政治家的思想和行为均以由权力来划分的利益为出发点，并认为这一假设已被历史事实所证实。因而，在所有外交政策中，国家以其权力的获得或增强为宗旨。同样一个政策，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他所关心的是“这一政策对社会的福利、或其中一部分人的福利有何影响”；对于法学家来说，他所关心的是“这一政策是否符合法律规则”；对于伦理学家来说，问题变为“这一政策是否符合道德原则”，而政治现实主义者则考察，“这一政策对于国家的权力有何影

①马基雅弗利《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页。

②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4页。